

上海垃圾强制分类第一周开出 190 张罚单

伴随着垃圾分类的新政实施,上海城管执法部门也同步展开了执法。数据公布,7月1日到7月6日,城管总共开出了190张罚单。

被罚最多的是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占问题总数的55%,其次为未按规定设置分类容器,占35%,而乱扔堆放垃圾占比9.2%。按地方来看,问题最多的则是商场,超过六成的单位罚单来自商场。(66%),其次为企事业单位(35%)、居住小区(32%)、医院(16%)、学校(10%)、党政机关(6%)。

分类垃圾桶和垃圾袋销量大增

做好垃圾分类,先要准备好装备,最近,买分类垃圾桶的上海人多了起来。某网购平台数据显示,6月最后一周垃圾桶销量,同比去年上涨五成。不过,即使在家分好了类,出门扔垃圾,还要准备好接受拷问。

志愿者“灵魂拷问”帮忙分类

“这是什么垃圾?”,这是垃圾分类志愿者刘阿姨这几天逢人便问的问题。上海市静安区陕

西北路上的晶华苑小区共有664户居民,靠着4名垃圾分类志愿者,居民对垃圾分类也越来越熟练。尽管多数居民投放前会自行干湿分类,但总不免有人分类不当,这时候就得靠志愿者人工二次分拣。高峰时段,装满一个垃圾桶大概只要15分钟。刘阿姨们要第一时间换上空桶。这份辛苦,居民们看在眼里。大家从最初撤桶时的不理解,到现在开始支持配合志愿者的工作。

还有居民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还享受到了垃圾分类带来的福利。一位上海市民张女士表示,小区明显干净了,而且可以用垃圾分类换来的绿色账户积分兑换毛巾牙刷等日用品。

无需餐具的订单量大幅增加

改变的还有外卖爱好者们,原来吃完直接一包扔掉已经成为历史,餐具肯定要单独处理。某订餐平台的数据显示,7月1日到7月4日,“无需餐具”订单量环比6月同期,增长了149%。7月起在上海地区,某订餐平台的餐具数量也成为了必选项,选“无需餐具”的订单量比之前大幅增长。

9城市已出台管理条例

目前,46个重点城市中的北京、上海、太原、长春、杭州、宁波、广州、宜春、银川九个城市已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46个重点城市中,80%以上对垃圾分类采取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分法”。比如,在重庆,四色垃圾桶已在不少小区“就位”,居民们已经开始慢慢适应。

对个人和单位违规投明确处罚

违规怎么惩罚?46个重点城市中,有25个城市明确了对个人和单位违规投放生活垃圾的处罚,针对个人违规投放,多数城市最高罚200元,单位违规投放或随意倾倒堆放生活垃圾的,最高处以5万元罚款。

太原、铜陵、杭州等城市还对违规投放垃圾增加了信用惩戒措施,违反规定,且拒不改正,阻碍执法部门履行职责的,相关信息将被依法纳入个人单位的信用档案。

怎么能查到乱丢垃圾的人?



在云南昆明,印有单位名称和垃圾分类二维码的可降解垃圾袋会按照单位名称发放到各个办公室,如果有人将垃圾分错了,相关部门就可以根据上面的名称和二维码完成追溯。

垃圾分类 防范“雨过地皮湿”

买分类垃圾桶的居民多了,点外卖无需勺子、筷子等餐具的订单也多了,自觉把垃圾分类好类的市民更多了……一周

来,上海扎扎实实推进垃圾分类,取得的效果实实在在。这说明,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上海打响了头炮,而其他地方也需要行动起来。垃圾分类不是一阵风,而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安排;也不局限于少数人、少数企业,而是面向全社会的提醒,推进垃圾分类不能止步于“雨过地皮湿”,停留于一时一地,而需要全社会都有紧迫感,始终铆足劲、绷紧弦、拉满弓。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垃圾分类如何用好 NGO 的力量?

近几年,“垃圾围城”现象备受关注,在政府部门积极治理和引导的同时,以垃圾治理为核心业务的 NGO 逐渐涌现,进行了如源头减量、分类投放、焚烧监督等诸多开创性努力。

2011年底,分散各地的 NGO 集结为网络型组织“零废弃联盟”,致力于整合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力量,协同推动垃圾危机化解。截至2019年6月,联盟已经链接了覆盖大部分省市的公益机构80余家,并通过战略性配合,打造了“一体多面”的民间垃圾治理体系。“一

体”为零盟秘书处。作为联盟核心,其专注于网络建设、成员赋能、政策倡导等。“多面”则是指联盟成员依据自身特征,在垃圾治理全链条中扮演多元化角色,实现战略性配合。

角色一,宣导员。此类机构以宣传教育为主业,致力于培育公众环境意识。比如深圳市绿宝垃圾分类指导中心依托其强大的志愿者团队,推出如“零污染”“有害垃圾回收”等宣传项目,并在政府支持下运营“零废弃体验基地”,做垃圾分类的传播使者。

角色二,先行军。此类机构利用 NGO 行动力强、体量小、试错成本低特征,因地制宜开展垃圾分类试验,从而推动公众行为变化。如上海爱芬环保多年扎根社区,首创湿垃圾除袋法和垃圾厢房改造标准,打造了普适于街镇的“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模式”。

角色三,监督方。此类机构旨在推动垃圾末端处置设施的运行安全无污染。如安徽芜湖生态中心基于信息公开申请和实地调研考察,搭建了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确保公众能便利、直观地监督焚烧厂运营。

角色四,倡导者。此类机构政治资源较为丰富,善于提炼实践经验、进行政策倡导,尝试推动法制进程、优化垃圾治理环境。

2017年,随着政策向好,越来越多的公益力量进入垃圾领域,与零废弃联盟衔接为一条完整的公益链。链条上游是诸如壹基金、阿拉善SEE基金会、万科基金会等支持型组织,其通过“壹起分”“创绿家”“社区废弃物管理”等公益项目为草根组织的垃圾治理行动提供资源;链条中游是零盟秘书处,聚焦成员网络发展以及政策研究与倡导;链条下游则是分布于各个城市的运作型 NGO,其扎根一线,切实推动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减量分

类、垃圾资源化处置、安全清洁焚烧等关键议题。

“社会组织对垃圾问题了解更充分,也更擅长社区动员,可以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让分类更有效推进。”“这些(NGO的)小姑娘很不容易的,天天待在这个院子里,和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一块儿管垃圾。”笔者在一线走访时,政府和居民无不对 NGO 的努力表示认可。

虽然成绩不俗,但垃圾议题 NGO 也面临诸多亟待回应的挑战:

首先,NGO 如何拓展网络,与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建立协同关系?现阶段,仅有少部分城市实现了垃圾的多元主体共治,更多区域的 NGO 仍然处于单打独斗状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因缺乏互动而导致资源耗散,削弱了行动绩效。对此,需要政府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放权赋能,激励社会组织进入垃圾治理领域。也期待政府在购买服务时分别考虑企业与社会组织的长项,不仅依托前者的垃圾分类新技术,也重视后者的社区工作经验,推动社企合作,整合先进科技与人文关怀,共同打通垃圾分类的“最后一公里”。

其次,NGO 如何基于垃圾分类撬动社区自治,实现“进得去”也“出得来”?当前,以商品房小区为主的“陌生人社区”占据

主流,这给垃圾分类带来很大挑战。NGO 进驻虽然成功营造了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但随着其工作人员撤出社区,因缺乏人情、面子、礼俗等纽带作为联结和约束,居民的分类意识与行动则会逐渐回退。为解此困局,NGO 需要与物业、居委会、业委会等社区力量密切配合,将垃圾分类嵌入社区自治框架,也即以分类为契机开展社区营造、链接社区关系、发掘社区能人,从而打造社区自身的互助、互督、互利机制,确保此前积累的绿色资本得以持续运转。

最后,NGO 如何更好地生存发展,有效服务于垃圾治理?笔者对垃圾议题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其工作困境主要包括人财物等资源匮乏、在部分领域受干预较多等。

有鉴于此,一方面 NGO 需要自我增能,争取社会信任,提升造血能力,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从多方面给予其理解和支持。不仅以客观、包容之心重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将其视作公共服务与社会监督的亲密伙伴。同时,也需避免将垃圾分类视为政绩跑步机,大干快干,片面追求效率。应树立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 NGO 共同讨论与探索,以绣花针精神着眼细节、滴水石穿。

(据新华每日电讯)

